

The inheritance and reform of pedag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rong educational country

Na Li

Guangzhou Urban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925 China

Abstract

The "Outline for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requires pedagogy to enha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educational scienc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pedagog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including stages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localized practices, and Soviet influenc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highlight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is closely tied to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has experienced two major ruptures. As a bridge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future, pedagogy must inherit correct knowledge, skills, values, ways of thinking, and excellent cultural traditions. Meanwhile, pedagogy also needs reform to adapt to contemporary demands, improv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promote equity. In balancing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e should adopt a critical approach guided by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retaining its essence while discarding outdated elements. This will driv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pedagogy, providing robust support for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Keywords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pedagogy; inheritance and reform; critically

教育强国背景下教育学的传承与变革

李娜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中国·广东广州 510925

摘要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要求教育学提升理论创新力,为深入理解教育学的发展逻辑,本文回顾了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包括引进西方理论、本土化实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影响等阶段,指出教育学发展与政治关系密切且出两次现断裂。传承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教育学要传承正确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优良的文化传统等。同时,教育学也有变革的必要性,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在教育学的传承与变革中,应秉持批判性态度,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教育学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

教育强国;教育学;传承与变革;批判性

1 引言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经过40余年的发展成就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实践基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成了世界上学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但教育规模的扩张并不等同于教育质量的跃升,教育强国的内核在于教育学的深度赋能。当前,中国教育仍面临原创性理论体系不足、跨学科协同创新薄弱、本土化实践范式待完善等深层挑战。

善等深层挑战。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等任务,本质上要求教育学要突破工具理性局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学知识体系。因此,在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教育学的传承与变革,平衡好历史积淀与创新发展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20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回顾

教育学,曾被定义为一门学科,或一门课程,抑或一类教材,本文所用教育学定义为在动态的意义上使用的教育学,将其规定为教育学者借助于一定的教育概念和教育思维方式对教育问题进行的一种学术研究活动,亦即一般的、专业的和完整的教育认识活动^[2]。

【作者简介】李娜(1986-),中国湖南郴州人,在读博士,助教,从事教育心理学、家庭教育、学前教育等领域研究。

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有着长远的过去，但却只有短暂的历史。《孔子》《礼记》《学记》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但并没有成为一门学科。狭义的学科意义上的教育学即便从1776年哲学家康德在德国格尼斯堡大学开始讲授教育学算起，至今不过240余年的时间。20世纪初，我国教育学者开始翻译日本、美国的教育学著作，例如王国维于1901年翻译了日本教育家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家》、周焕文等译小泉友一著的《教育学科学》（天津官书局1906年版）、尚仲衣1929年翻译1935年出版了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商务印书馆）等^[3]。因此，叶澜曾指出：“引进”是中国教育学从“娘胎”里带来的印记^[4]。20世纪20-30年代，有学者认识到照搬照抄解决不了中国的教育问题^[5]，提出了教育本土化的思想并进行实践。例如，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外晓庄村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1926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并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此外，我国教育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教育学原理，如杨贤江1929年出版的《新教育大纲》。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和社会动荡，教育资源和学术环境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导致教育学的研究与实践难以正常进行，其发展进程被迫中断，几乎处于停滞甚至被破坏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教育学直接取法苏联，当时，中国教育学者学习苏联教育学主要是通过翻译引进苏联的教育学教材、邀请苏联教育学和心理学专家来华授课、派遣留学生和专家去苏联学习等途径。凯洛夫的《教育学》成为全国各个师范院校的指定教材^[6]。苏联来华第一位专家是波波夫，给中国人民大学教育教研室的全体员工和进修讲授新型的教育科学；第二位是彼得鲁舍夫斯基，给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班讲授《心理学的哲学基础与自然科学基础》当时参加学习学习的都是各个师范院校的教授讲师，如郭一岑、朱智贤、胡寄南等；最后一位专家为彼得罗夫斯基^[7]。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教育学发展再次进入停滞甚至被破坏阶段，教育教材亦成了政策汇编、语录汇编。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教育学重新起步，教育学者们秉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进行了国外教育学科相关教材、理论的翻译、引进，在此基础上，由中国教育学学者不断努力，教育实践不断发展，逐步走出了中国化本土化的教育学。

从整个教育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与政治的关系非常紧密。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出现了断裂，即全盘否定过去，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这对于教育学学科的发展来说，是一个灾难。叶澜教授曾在《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一文中提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科发展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等，这些问题是影响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8]。教育学的发展随着政

治的变化不断变化、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被动的，与过往几乎是割裂开的，不具有连续性。

3 教育学为什么要传承？我之为我

什么是传承？《汉语大词典》将传承定义为“传授和继承”，强调其动态过程与结果^[9]，是指在历史长河中，一代人将知识、技能、文化、价值观等传递给下一代的过程。它确保了人类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使社会能够积累并保留过去的经验和智慧，为未来进步奠定基础。传承具有连续性、选择性、创新性和适应性等特点。传承作为“时间桥梁”，通过代际对话，将过去转化为未来的资源，例如孔子“因材施教”教育思想在AI时代的诠释以及应用。

因此，教育学的传承，其实是对教育学哲学上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基本回应。我不是凭空产生的，正如没有过去，我不知道我是谁，失去传承，我之教育学并非我之教育学。传承对于教育学而言，是其身份认同的基石，是学科自尊的源泉。通过传承，我们得以明晰教育学的历史脉络，理解其独特价值，从而建立起对学科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只有珍视传承，教育学才能保持其独特性和生命力，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的人才提供坚实的支撑。

教育学传承的主要内容包括四点：一是传承知识技能使新一代人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发展和创新。二是传承价值观念使个体能够内化这些价值观念，成为有道德、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三是传承思维方式培养个体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四是传承文化传统使个体了解和认同本民族本国的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信。

4 教育学为什么要变革？我将何往

变革是一种深刻且全面的变化过程，不仅仅是表面的调整或改良，而是对旧有模式、结构或观念的彻底反思与重构，旨在向更高层次、更适应时代发展的方向演进。变革意味着人在自觉、主动地作为，其背后必然存在着动因。而变革的非连续性决定了它不同于科学常规发展阶段的累积，一定表现为对以往的明确否定。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否定过往存在状态而需要主动变革呢？依循汤因比的理论，教育学的变革也可以用“挑战与应战”加以解释，即教育学的变革应有其自身所导致的困境，此困境使人们觉察到某种威胁的到来，为了消除威胁，人们开始努力，变革教育学就是这样一种努力^[10]。

推动教育学要变革的威胁是多方面的，既受到内部因素的驱动，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驱动教育学变革的内部因素：一是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和期望在不断变化。传统教育理念和目标往往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导致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因此，教育学需要变革，以更新教育理念、明确新的教育目标，使教育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二是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注重知识的灌

输和记忆,而忽视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教学手段也相对单一,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积极性。教育学变革需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项目式学习、探究式学习等,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驱动教育学变革的外部因素:首先,适应时代发展需求: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教育学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变革教育内容和方式,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国际视野和跨学科能力的人才。其次,科技的进步为教育学变革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教育提供了新的教学手段和资源,如在线教育、虚拟现实等;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要求教育学不断更新知识内容,培养学生的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

再者,人口结构与社会变迁也是驱动教育学变革的一个外部因素:老龄化社会要求教育注重老年人的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少子化现象则促使教育更加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此外,社会变迁如城市化进程、家庭结构变化等也对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教育学的变革以适应这些变化。

5 教育学要在变革中批判性地传承

由于教育学从发生学意义上具有舶来的品性,其对国外教育学的依附自然难免。不过,纵观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之路,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在教育学的理论建设中,亦步亦趋的成分越来越少,独立创造的因子越来越多。时至今日,我们已放弃了全盘接受和全面否定的态度。研究者多认同立足中国教育现实,寻找本民族与外来教育融会贯通的契合点是实现本土化、摆脱对西方教育学的依附的根本途径。

变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它打破陈规陋习,引领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教育领域,变革同样不可或缺,它促使我们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育方法,以适应时代对教育的需求。

然而,变革并非意味着全盘否定过去,而是在传承中寻求创新。传承,是对过去的延续,是智慧的积淀。当教育脱离了对一个民族的价值、理想与信仰的文化遗产的时候,人的塑造就成为无根之木,教育的根就丢掉了^[11]。我们曾有全盘否定的时期,导致文化断裂,教育受损。因此,理性地传承显得尤为重要,它需要教育学人具备文化自觉,明辨是非,去粗取精。

因此,教育学的我之为我,教育学的我将前行。教育学何以做到在变革中批判性地传承?

首先,需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要求我们对教育的历史、传统文化的过往秉持审慎的态度,既不盲目崇拜,也不轻易否定。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要对教育的过去进行深入剖析,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需要以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保留那些仍然具有时代价值的部分,摒弃那些已不适应现代

社会发展的内容。同时,面对当下环境的快速变化,我们要保持高度的敏锐度,及时捕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更要有质疑精神,不迷信权威,不盲目跟风,而是要独立思考,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其次,在态度上,教育学在变革中需秉持批判性传承的态度,敢于正视其发展的历史全貌,包括那些不为人知的“黑历史”。这些历史片段,无论光彩与否,都是我们教育学走过的“来时路”,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承,并非简单地复制过去,而是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上,以一种连贯的视角连接过往的教育学与未来的教育学发展。它要求我们铭记教育学的身份与根源,深刻理解并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特性,弘扬本土的优秀传统特色。通过这样的传承,教育学方能在变革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成为一门更加优秀卓越的学科。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批判性传承的核心要义。教育学在变革中朝着理论的本土化、学科体系的完善化、关注点的实践化等方向发展^[12]。

综上所述,教育学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面对时代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正视教育学的传承与变革,既要铭记历史、坚守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在传承中汲取智慧,在变革中寻求突破,推动教育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只有这样,教育学才能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5
- [2] 石中英.论教育学的文化性格[J].教育研究,2002,(03):19-23.
- [3] 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的反思[D].华东师范大学,2000.
- [4] 叶澜等.教育概论[M].人民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三版.
- [5] 侯怀银.共和国教育学70年[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470.
- [6] 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05):52-94.
- [7] 黄秀兰,李娜,周小丽.天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思想精要[M].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10.263.
- [8] 叶澜.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J].教育研究.2004,(07):3-17.
- [9]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5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876.
- [10] 刘庆昌.论教育学的变革[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3(01):91
- [11] 田增志.文化传承中的教育空间与教育仪式[D].中央民族大学,2010.
- [12] 陈荟,吴炎.教育学变革的动因及走向分析[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7,9(03):1-4